

主编◎潘文国 陈勤建

中文研究与国际传播

(第2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
杨浦区
国定路
300号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主编◎潘文国 陈勤建

中文研究与国际传播

(第2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文研究与国际传播. 第2辑/潘文国, 陈勤建主编.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6
ISBN 978-7-5675-0902-3

I. ①中… II. ①潘…②陈… III. ①汉语—对外汉语教学—教学研究—文集 IV. ①H1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31177 号

中文研究与国际传播(第2辑)

主 编 潘文国 陈勤建
策划组稿 龚海燕
项目编辑 王国红
审读编辑 车 心
责任校对 时东明
装帧设计 黄惠敏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华大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18.25
字 数 362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一次
印 数 1100
书 号 ISBN 978-7-5675-0902-3/H·643
定 价 38.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中文研究与国际传播》 编辑委员会名单

主 编：潘文国 陈勤建

编委会主任：吴勇毅

编委会委员：(以姓氏汉语拼音为序)

陈勤建 傅惠生 顾伟列 刘 正 潘文国

吴勇毅 徐子亮 姚美玲 叶 军 张建民

卷首语

《中文研究与国际传播》第2辑与大家见面了。在学院同仁与学界专家的支持下,与上一辑相比,本辑的内容更加丰富。为此我们对专栏的设置也作了一些调整,以使内容更加清晰,便于读者选读批评。

相对于上一辑的“专论”,本辑推出了一个新栏目“热点探讨”,针对社会上与语言与语言教学相关的一些热点问题进行追踪和探讨。本辑选择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当前社会上“英语热、汉语冷”的现象,二是就《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出版引发的一些讨论,三是汉语字本位问题争议引起的一些后续讨论。由于是热点问题,社会各界观点不一,本刊发表的文章只能代表作者的观点,我们希望能引起大家的重视与关注,毕竟语言作为与人和社会关系密切的学科,不是象牙之塔,最终必须服务于社会。

原有的“文化研究”栏目,因为内容较多,我们进一步细分为“国际汉学研究”和“文化与文化教学”两个栏目。前一个栏目收录了研究新加坡、日本、澳大利亚和法国等地汉学研究的文章。后一个栏目则既有对中国哲学、中国文学原典的研究,又有关于2012年在华东师大召开的第八届中国文化论坛暨国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青年论坛的内容。

原有的“比较研究”与“教学研究”两个栏目,也因为内容有了拓展,调整为“汉语与汉语教学研究”及“汉外对比与对外汉语教学”两个栏目。前者侧重对汉语本体和对“内”汉语教学的研究,后者侧重汉语与外语的对比研究及相应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前一栏目下的《语文教育困境的病根及出路》是一篇值得注意的文章,它对当前国内小学母语教育的现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而后一栏目的汉外对比与对外教学涉及了韩、日、俄、英、法四种语言。

原有的“汉语国际推广研究”栏目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为“汉语国际教育研究”,本辑发表的两篇长文都是汉语国际教育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一是国内已成燎原之势的高校对外汉语专业(现改称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专业实习问题,一是汉语国际教育志愿者在海外从事教学所遇到的实际问题。撰写文章的两位老师陶健敏和华霄颖都长期致力于这两个领域的研究与实践,他们的文章应该会引起相关人士的兴趣。

最后,本辑还增设了一个“史料”栏目,主要请有关老专家回忆对外汉语教学在我国发生发展的历史。本辑请汪寿明先生回忆了华东师大对外汉语教学开始的一些情况。

本刊编辑部

目 录

1 卷首语

本刊编辑部

【热点探讨】

- | | | |
|----|-------------------------------|-----|
| 1 | 母语能力是外语学习的天花板——在 2012 上海书市的演讲 | 潘文国 |
| 13 | 读潘文国“母语能力是外语学习的天花板” | 左 飏 |
| 19 | 立足于字,用形象分析法解释汉语——答陆俭明先生 | 李华倬 |
| 31 | 关于《现代汉语词典》的思考 | 戴汝潜 |

【国际汉学】

- | | | |
|----|---|-----|
| 38 | 新加坡华语及儒家伦理推广之回顾与思考 | 顾伟列 |
| 47 | 四重证据说视野下的京都考证学派 | 刘 正 |
| 73 | 论《源氏物语》对白居易讽谕诗的受容 | 易 兰 |
| 81 | C. P. Fitzgerald and His Study of the Tang Dynasty
(汉学家费子智的唐代研究) | 樊 琳 |
| 89 | 在相遇和共享中永葆开放生命的行进——读程抱一先生《美的五次沉思》 | 蒋向艳 |
| 94 | 美国学者《西游记》佛道之争之研究 | 谷 煜 |

【汉语与汉语教学研究】

- | | | |
|-----|-----------------------------|-----|
| 105 | 语文教育困境的病根及出路 | 曹念明 |
| 113 | 裘锡圭“三书说”刍议 | 张德劭 |
| 118 | 两汉铜器铭文研究现状分析 | 王 卉 |
| 124 | 单音形容词构成的疑问句 | 李 泉 |
| 133 | C° 位置下汉语主宾语从句标记“的”的习得研究 | 金志军 |
| 147 | 也谈“吃他三个苹果”——“他”结构的四种解释假说的评述 | 陈流芳 |

【文化与文化教学研究】

- | | | |
|-----|--------------------------------------|-----|
| 159 | 电视剧中的文化: Intelligence plus character | 吴勇毅 |
|-----|--------------------------------------|-----|

161	先秦认识论中的辩证唯物论因素	卢守助
171	谈谈通读原典对准确解读作品的重要性 ——以苏轼《前赤壁赋》等的解读为例	邵明珍
180	汉语跨文化教学中影像与文字的互动 ——以动画片《木兰》与《木兰诗》为例	肖 路
188	国际汉语教学中记忆与遗忘关系探析	徐子亮

【汉外对比与对外汉语教学】

197	韩汉语人称代词用法对比	金红莲
203	从韩国成语看韩中两国成语的特征	任少英
214	日本学生离合词使用偏误分析及对策	徐少芬
220	论“多维发展模式”中的“可变性序列”在汉语作为 第二语言教学中的运用	李清宇
226	美国学生汉字笔顺学习策略的个案研究	刘 弘 朱 琳
236	针对法语国家学生的汉语新词教学探究	朱晓琳
242	对外汉语听力教材的现状和改进对策	杨初晓
247	论合作学习理论在商务汉语教学中的应用 ——以高级商务汉语口语课为例	包文英

【汉语国际教育研究】

256	论国际汉语教育背景下国内高校对外汉语专业教育实习模式创新 ——以 ECNU - SAS 合作实习模式为例	陶健敏
267	汉语教师志愿者教学适应问题及对策研究	华霄颖 储文怡

【史料】

282	华东师范大学留学生办公室成立(1965)	汪寿明
-----	----------------------	-----

作者通讯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邮编 200062

E-mail: wgpan@hanyu.ecnu.edu.cn

母语能力是外语学习的天花板

——在 2012 上海书市的演讲

潘文国

(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上海)

大家好！这里是 2012 上海书市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公益讲座。我要讲的题目是“母语能力是外语学习的天花板”。这个题目我不仅想对青少年和学生说，更想对大人、特别是家长和教育工作者说。更明确地说，我想对整个社会乃至政府说。

到这个报告厅，看到这个题目，我想大家马上会有两个反应。一是奇怪：一个搞外语的专业出版社、名社，在这么一个重要场合举办的讲座，怎么不谈学习外语的重要性，却要谈与它关系不怎么大的，甚至还有点针锋相对的“母语”学习（因为“母语”就是“非外语”嘛）？二是好奇：学习外语跟母语有什么关系？“天花板”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用这么一句耸人听闻的话来做演讲的题目？我就先回答这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外语出版社举办的讲座要谈母语学习的重要性？这正说明了这个问题的重要，真正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甚至到了连专门从事外语出版的人也看不下去，觉得有必要发声了。本来，在商言商，卖瓜的说瓜甜，各人吆喝自己要卖的货色，这是天经地义的。卖外语书的自然该说学习外语的重要性，而语文学习的重要性该留给卖语文书的去说。现在我们来谈这个题目，倒不是要抢卖语文书的人的话头，而是觉得由我们来说这个话比由他们来说更有说服力。因为第一，我们来说，不会有“老王卖瓜、自卖自夸”的嫌疑；第二，正因为我们是外语和外语教育方面的专家，我们更知道学习外语的甜酸苦辣，更知道学好外语的关键在哪里，也更能体会母语在学习外语中的重要性。

我还想补充一句，这个讲座的主题是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社长庄智象教授亲自

选定的。庄社长是一个非常有战略眼光的出版家,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外语教育理论家,因此选择这个题目对他来说,是一个相当慎重的决定。这体现了他以及上外社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学者的学术良心。多卖外语书、鼓励大家多学外语诚然是我们的责任,但告诉大家怎么学好外语、用好外语,怎么更好地让外语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服务,为个人的成长和进步服务,更是我们的任务。而学好外语,一定要打好母语的基础,这是我们的基本认识。因此我们要利用今天这个平台发出强烈的呼吁。

第二个问题,学习外语跟学习母语究竟是什么关系?什么是天花板?我先回答后一个问题,“天花板”的全称是“玻璃天花板”,这个词来自英语 glass ceiling,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产生的新词,原来是比喻一种人为设置的、无形的障碍,用来阻碍某些人(特别是女性)在职场上的上升。把天花板与外语学习相联系是引用我说过的一句话。2011年春节前后,我接受了《解放日报》的一次采访,发表时题为《语文歧视与中文危机》,内中有一句话:“多年的观察和研究使我得出一个结论:外语的真正水平是以母语能力为前提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个人外语水平的上限就是他母语水平的下限。低下的母语能力就是学外语者头上的一块难以突破的天花板。”大概这句话说得有点危言耸听,因而全国许多报刊都引用了。由于那次接受采访的时间比较短,我的想法没有更多展开,今天想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作进一步交流。

我为什么特别强调母语在学习外语中的重要性?我想分几方面来谈。

一、母语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

19世纪的德国哲学语言学家洪堡特说过一句话,“每一种语言里面都隐藏着一个独特的世界观”。这个观点直接导致了20世纪初西方哲学研究的语言转向,对哲学界和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所谓“世界观”是一个哲学概念,就是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人怎么看世界?至少需要有两个东西,一是对事物的认识和分类,包括对事物的价值判断,这就是词汇;二是组织思想、进行表述的方式,这就是语法(不要一提语法就想到主谓宾、名动形那一套,主谓宾、名动形只是语法的一种,不是全部。中国古代不讲这一套,但仍然有语法)。而这两项都与语言息息相关,有非常强的民族性。不同的母语背景,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的基因,而这是从小就形成的。一个人的母语是中文,他的思维方式就必然是中国式的;如果他的母语是英文,他的思维方式就必然是西方特别是英美式的。这句话还可拓展到普通话和方言,如果你从小说的是上海话,那你的思维方式就是上海式的;如果你从小说的是普通话,那你的思维方式就是普通话式的(前几天上海遭“海葵”台风来袭,一位现场记者在报导时说,水都漫过“上街沿”了,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后来才发现普通话里没有这个说法,最多用个笼统词“人行道”)。思维方式之间没有绝对的好坏对错之分,但却有侧重点的不同。我们进行中西思维方式

比较,常常会说到,中国人偏重形象思维、西方人偏重逻辑思维;中国人偏重辩证逻辑,西方人偏重形式逻辑;中国人偏重系统思维,西方人偏重原子思维,等等。这些都互有长短,不能说谁好谁坏,但却植根在民族语言之中,成了一个民族的世界观。学习一门外语,等于跳出一种世界观的圈子,进入另一种世界观。学会一种外语,也等于学会用另一种方法来思考问题,这对于一个人的个人发展无疑是有好处的。一个人懂的外语越多,他越能理解别人的思维方式,而且自己也会多几种看待世界的眼光和方式。这是我们需要学习外语、鼓励多学外语的原因。但是在各种世界观中,母语世界观是最基本的,是一个人立身之本。所谓“立身之本”,就是对自身在这个世界上地位的认同。一个人从小学中文,他长大就会有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认同;一个人从小学英文,即使他是中国人生的孩子,但他长大后对中国和中国文化就不会有认同感。这正是在海外的二代、三代华人华侨所面临的最尖锐的问题,也是在海外打拼多年,面临渐渐长大的“黄皮白心”的孩子们的家长们所最痛苦的事情。出生在中国的中国孩子,却希望他从小接受英语式教育,结果长大成了一个对中国没有认同感的孩子,难道这是我们的家长所希望的吗?有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会说,我就希望我的孩子将来到国外去,移民、入籍,做外国人,我就要让她早点断掉中国文化的根。对此我只能说,我尊重你的选择,但你的选择不等于孩子的选择。你不想做中国人,不等于你的孩子将来也不想做中国人。万一她将来想做了呢?那可很难再回来了。你现在就替孩子作终身的决定未免太残酷了吧?我在国外遇到过许多华人朋友,他们最痛苦的事情,是孩子不肯学中文!是孩子看不起英文说得不流利的自己的老爸老妈!

二、所谓“不要输在起跑线上”

当前的“外语热”,最可怕、最让人担忧的还不是各种各样的等级考试、职称考试、出国考试,也不是压倒一切的外语课程设置。当然这些也让人担忧,在适当的场合我也会讲讲这些问题。但最令人担忧的还不是这些,而是外语教育的低龄化、“超低龄化”。什么叫“低龄化”?在我读中小学那个年代(1950年代),外语的起始教育是从高一开始的。后来变成了从初一开始,再后来下放到了小学。一开始还是小学高年级(我儿子上学那个年代),后来逐年降低,从五年级、四年级、三年级逐步降到“有条件的从小学一年级开设”。这就叫“低龄化”。什么叫“超低龄化”?学外语的开始阶段放到了小学一年级,还不能使某些人和一些家长满意,他们还要把时间提到学前,在孩子还没开始受正式教育的时候就让她先来学外语,于是开设了各种幼儿班、学前班(据说还有主张外语胎教的)。我前天看到报纸,说有一种2—6岁英语班十分红火。这就是“超低龄化”。小孩还没开始学习,周围的世界对她还是一片陌生,却要她开始学说外国话,想想实在滑稽,但却有人乐此不疲,有人(主要是商家)摇唇鼓噪,有人(是那些无

知而可怜的家长)相互传授“经验”,其实是交流无知。他们的理由有两条,一是“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二是根据“科学”的研究,幼儿是学习外语的最好时期。我们先来看第一条理由。

第一条,“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可说是这些年来最蛊惑人心的一个口号,打着“从娃娃抓起”的诱人借口,抢分幼儿教育的蛋糕。这年头,要“从娃娃抓起”的东西实在太多,外语之外,钢琴、音乐、舞蹈、武术、画画、书法、棋类、足球、电脑、动漫,只要你想得到的事,都得“从娃娃抓起”。最有意思的是前不久伦敦奥运会期间国内的一条新闻报道:“卖萌,从娃娃抓起。”“从娃娃抓起”,永远不会错,从小打好基本功,对学习任何东西都重要。问题是,这都是各行各业的噱头,真要全部落实到一个个幼儿个体上,谁吃得消?但就有我们的那些家长,听一个,相信一个,听两个,相信一双。这就苦了她的那个孩子,今天学英语,明天学钢琴,后天练跆拳道,大后天还得学 Snooker。这就使中国的小孩成了天底下最痛苦的儿童,所有的时间全部排满,周末、假期尤其不放过。没有自己的兴趣,没有自己的时间,一天到晚除了完成学校布置的作业之外,就是完成爸爸妈妈为她设计的据说是为她好、为了她“不输在起跑线上”的种种安排,从这个班转到那个班,行走道路,疲于奔命。现在很多年轻人看到中国的小孩这么痛苦,结婚后就发誓不想生小孩,免得她出生后受苦。对此我非常同情。在千方百计要把孩子送到国外去念书的人中,也有一部分家长抱这种心态,对此我也非常理解。“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这句口号太荒唐了,太作孽了,太害人了!现在是到了该把这条口号彻底抛弃的时候了。

其实,从道理上来分析,这条口号也是一个伪命题。“起跑线”的说法源于田径和一些类似的运动如自行车比赛等。对于一些短程比赛如 100 米跑、110 米栏等,起跑的时间确实非常重要,0.1 秒甚至零点零几秒的起跑速度之差对于整个比赛的成绩有重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对一些长距离的比赛,如万米长跑、50 公里竞走,或者马拉松比赛,这起跑线上的几秒钟就无所谓了。至于径赛以外的运动项目,如田赛,如球类、如举重,我们根本就没有听说过“起跑线”的说法。要求一切运动都“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对于体育运动来说都是荒谬的,更不要说体育以外了。

就以外语学习而言,前面说过,我们国家在历史上学习外语的起始时间,就曾经有过从高中开始、从初中开始、从小学高年级和低年级开始的各种实验。如果按照“从娃娃抓起”“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说法,当然应该是从小学一年级学起的人外语学得最好了?但是可惜,没有一家教育机构,或者教育调查机构,或者社会调查机构,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数据,证明从小学开始学外语的人,比从高中开始学的人,在成才方面表现出更大的优势。相反,据我的观察,这些不同阶段开始学外语的,到学成以后(强调学成以后,是指学习的结果,而不是在过程中作比较)来看,“什么时候开始学”体现不出很大的区别。也就是说,从小学开始学的人,并不一定比从高中开始学的人英文更好。例如我这一代人都是从高中开始学英语的,我就看不出我们那批同学的英文比现

在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开始学的人的英文差得到哪里去。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如果从高中开始学也能达到从小学开始学同样的效果,我们为什么偏要多学那9年、多花那么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呢?事实上,从开始把外语课下放到初中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三年是多余的。当然,如果现在我提出主张从高中开始,那可能会遭到群起而攻之,那些主张从幼儿时期学,甚至进行外语“胎教”的人更会恨不得把我打死。那么我退一步,折中一下,从初中开始,我认为已经足够了。再往前,我认为就是时间和各种资源的浪费。

当然我这里指的是正常的学习。对于那些不正常的,比如一门心思想出国的,甚至不想做中国人的,那就不在其列了。但是那样的人无论怎么算都是极少数,尽管他们在舆论上的能力很强。一个正常的社会不应该被极少数别有所图的人所绑架。

三、关于“幼儿是学习外语的最好时期”

第二条是关于幼儿是学习外语的最好时期的问题。我们常常听到有人、甚至是一些语言学家或者教育专家说,“学习外语要从小抓起,越早开始越好”,还有人提出据说是经过科学研究得出的结论:“学习外语的最佳开始年龄是四五岁左右,往后,年龄越大效果越差。”正是在这样的理论鼓噪之下,我们的家长才会对幼儿外语教育趋之若鹜,我们的一些教育机构也会热心地把学外语的时间越提越早。而今天我想对这种理论或说法大声说“不!”我们必须从源头上纠正这种荒唐的理论。

有人会说:“哈,你又不是教育学家或者儿童心理学家,幼儿期是学习语言、开发儿童智力最好的时期,这是全世界儿童心理学家、语言学家得出的共同结论。你一个人能把它推翻?”我当然不能推翻,也不想推翻,因为我赞同儿童智力开发的理论,也赞同儿童学语言越早越好的观点,尽管对具体在什么年龄段开始学我有些不同看法。那么我同“学外语越早越好”论者的分歧在哪里呢?请大家注意,这里有人玩了偷换概念的把戏。“学语言”不等于“学外语”,一字之差,说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当我们在说“幼儿期是学语言的最佳时期”或者“学习语言越早越好”的时候,我们的“语言”指的是母语,即本国语,甚至更具体到本族语、本地语、“妈妈说的话”,而不是外语。只有当“外语”在儿童的生活环境里具有了“母语”的地位,“学外语开始得越早越好”这句话才是有意义的。譬如说中国孩子从小生活在美国、英国或者其他英语的环境里,或者尽管生活在中国或其他非英语国家,但家里人包括保姆,彼此之间都说英语(我这里排除了有些中国家庭里,家长仗着自己学过英语,坚持对孩子只说英语,以为这就为她创造了“英语环境”,其实只要你家庭里其他人彼此说的都不是英语,这种环境是假的,因为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你以为孩子不懂事,不会注意不是跟她直接说的话,其实她听在耳里,早能区别出母语和外语)。在中国,除了外国人家庭,这样的条件基本上是不具备的,

因此“学外语从幼儿开始”也基本上是不适用的。有人说,我把孩子送到外国人办的外国学校去,行不行?那当然可以,但前提是:一、在学校里不使用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二、在学校外你也要给孩子创造基本上不使用其他语言的环境。这两条,据我所知,即使在上海也不容易达到,例如学校里不可能纯是英语国家来的教师,而那些年轻的中国老师除了上课内容以外的英语运用能力,我是非常怀疑的(不妨举个例子,我有一位嫁给外国人的熟人,把孩子送到了外国人在上海办的学校。从此她就多了一项工作,每周帮她孩子的英语老师把她对小孩的评语翻译成英文。为了自己的孩子,她不敢得罪老师,只好无条件地接受);再比如送孩子去那些学校的家长本人并不都具有英语能力,无法在家里配合进行教育,更不要说延伸教育。孩子处在中英文交杂的环境里,这怎么学得好呢?而在这些条件都不具备的一般学校,特别是打着“双语教育”牌子的学校,英语只是一种纯粹的外语教育,效果更是无法令人乐观(当然,如果有人把学会说“Hi!”“Bye-bye”或唱几首英文儿歌,也算“学会”了英文,那又当别论了)。

四、“学说话”和“学语言”是两回事

大家可能注意到我上面还说了一句话,我赞同那些语言教育家的观点,赞同学语言越早越好,但在开始学的年龄段上有不同看法。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因为我认为,在语言学习的问题上,需要了解两种区别。第一要区别母语和外语,学母语要从幼儿开始,越早越好,学外语却未必。第二,要区别口语和书面语,这也是两个概念。口语就是说话,书面语则除了说话之外,还要有阅读和写作的能力。为了方便起见,我们这里暂时把学口语叫做“学说话”,把学习包括口语和书面语都在内的语言叫做“学语言”。我们需要明白,“学说话”和“学语言”是两回事。而“学外国说话”和“学外国语言”更是两回事。对母语来说,说话是在自然而然的状态下自然学会的,语言教育学上把这个过程叫做“习得”(acquisition)。我们知道小孩大约一岁半开始会说话,并不需要刻意地去教他,也不需要编什么循序渐进的“科学化”的教材,到了那个年龄,正常的孩子都能说话,只是父母和家庭能替她创造一个好的说话环境,起一种促进、帮助的积极作用,因此没有必要强调从什么年龄段开始“习得”。而“外国的说话”却没法像母语那样“习得”,必须要通过有意组织的教学才能学会。这有意组织的教学就叫做“学习”(learning)。由此可见,“学习”和“习得”是两回事。母语的口语可以习得,而外语的口语必须“学习”。婴幼儿是“习得”母语的最好时期,不能偷换概念,把它说成是“学习”外语的最好时期。

另一方面,对书面语来说,不论母语外语,都是个“学习”过程,也就是说,都要经过有意识的组织与安排,才能学会。话是人人会说的,但读书作文不是人人都会的,因此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非常重视母语书面语的“学习”。用中文来说是学习读书作文,

用英文来说是 learn to read and write。这个过程就叫做“扫盲”，用英语来说，就是从“illiterate”到“literate”。一般来说，学习一种语言的主要目的就是达到了扫盲的目的，学本国语文、学外语，都是如此。我们很少听到学语言只是以学说话为目的的。有的儿童英语培训班打的是“学说话”的旗号，那也就是说，他们只是培养会说几句英语的 illiterate，也就是英语“文盲”，而并不管书面语的读写。这作为一种游戏形式让小孩玩玩未尝不可（几年前有一次我作客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曾支持过这种游戏活动）。但千万不能认为这就是在“学英语”。如果有家长这样认为，后来却发现小孩其实没学会什么东西，那是不能怪别人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还想多说几句。从“学说话”和“学语言”的关系看，学习母语主要是学书面语，而学外语则口语、书面语两个任务都有。传统的语文教育，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是重书面语的。外语教育也是如此。结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培养的外语人才读写还可以，口语却很差，出了国门，听不懂，说不出，被人讥笑为“哑巴英语”，饱受诟病。20 世纪从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开始，把语言等同于口语，认为书面语只是口语的记录、文字只是记录语音的符号，以后几乎所有的语言理论都围绕口语来进行。受之影响，语言教育理论也把重点转到口语上，所谓的直接法、交际法、功能法，直至现在所谓的“任务型教学法”，都把口语作为重点。这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学习者说话能力比以前有提高，语音语调比以前正确，说话流利，有人甚至可以滔滔不绝（尽管有时不知他在说些什么），但读写和翻译能力下降。在今年 5 月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组织的第六届全国英语专业院长/系主任高级论坛上，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张绍杰教授把这种现象叫做“从哑巴英语到文盲英语”，这是很值得英语教育者和英语学习者深思的。总不成我们辛辛苦苦学了那么多年，目的只是为了把自己培养成外国文盲吧？以前是一开口就出错，现在是一落笔就出错，外语学习可探讨的问题多得很呢！

回到儿童学英语上。口语的开始期全世界儿童几乎都一样，所谓儿童学习语言的开始期主要是指学习书面语的开始期。我之不同意某些学者说的 4—5 岁是关键，就指的这个开始期。我认为，这个开始期的早晚与语言本身的特点很有关系。4—5 岁是使用英语或者其他拼音文字语言国家的研究者提出的观点，对他们国家儿童什么时候开始 learn to read and write 可能是适用的，而对于中文来说却并不适用。对于中国人学习外文尤其不适合。因此这里实际上是三个问题。一、对于英美儿童学他们自己的书面语，由于拼音文字是非常抽象的符号，儿童要识记很困难，过早过晚开始都会影响智力的开发，因此他们的科学家经过研究，把这时间定在 4—5 岁，我觉得是合理的。二、对于中国儿童学习中文。由于汉字是表意文字，具有形象的特点，易认易记易学（缺点是不易写，因此传统的语文教育强调读写分开，读的是“三百千”，写的是“上大人孔乙己”），可以开始得更早。我的观点是两岁至两岁半便可开始。三、中国人学英文。如果说西文字母对西方儿童来说很抽象，对中国儿童来说就更抽象。加之学外语不是学母语，不能靠“习得”，只能靠“学习”，“学习”是需要主观能动性作支撑的，因此一定

要在智力发育好以后。2—3岁不行,4—5岁也不行,甚至12—13岁前都不合适。因此我的意见最好放到完成小学教育之后。

五、学好母语是学习外语的起点

上面我说到学习外语的最佳时间是“在智力发育好以后”,这里的“智力发育好”是以什么为标志呢?我认为就是母语能力。母语基本学好了,既打下了思维能力的基础,又打下了学习其他语言的基础。这是最合适的时机。以后水涨船高,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中,随着母语水平和理解能力、表达能力的不断提高,外语能力也会不断提高。在母语能力不足的前提下,任意提前学习外语的时间,实际上只能拔苗助长,欲速则不达。只能撞上我所说的玻璃天花板。

有人可能不以为然。证据是:一,有的人自称,或别人夸他,“外文比中文还好”,说得活灵活现。二,有人更具体告诉我说,某某的儿子还在读小学五年级,可是英语已经通过高三的考试了。

对此我不知你们怎么看?要我说,那都是假的。说某人的外文比中文好,除非他是在国外受的英文教育,因而他的英文有了“准母语”的水平,而中文只是一种“类外语”的客串,就像我们看到的有些第二代华人华侨那样。如果是在中国接受中国的教育,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试问,一个在中国同时接受中、英文教育的人,中文的思路不清,英文的思路反而会清晰?中文辞不达意,英文却总能找到确切的“那个词”?甚至,中文的报纸看不懂,一定要看英文报纸,那是天方夜谭吧?试问,那些把“蒋介石”翻成“常凯申”、把“孟子”翻译成“孟修斯”的人是中文不好而英文太好了?那样的“好英文”谁敢读?实际上,说某人“外文比中文还好”往往是不懂外文的人对懂外语的人的羡慕之辞。学外语的人没有一个敢说自己的外文比中文还好。而羡慕别人“外文比中文好”实际是在拿自己的外文跟人家的外文比,把人家的中文跟自己比,而不是把那个人自己的外文跟中文比。因而,这实际只是个“美丽的谎言”而已。

至于那个考过高中英语的小学生,我倒不怀疑他的成绩的真实性。问题在于我们的外语教育方法和考试方法。现在最流行的考试方法是 TOFEL 考试开其先例的所谓“客观试题”,这种多项选择题的模式自从 1986 年首次引进以后已成了万能的考试模式,各类考试争相使用。客观地说,这种考试方法无疑有其优越性,例如判卷公正快速,能够很快根据所需划定一条取舍标准等。但其不足也是显然的,第一,这是一种“水平”考试,而不是一种“能力”考试,其结果只能告诉你过了某条线,并不能告诉你是否具备了某种能力。很多在中国 TOFEL、GRE 得高分的人到了美国被发现英语很差,听说读写都不符合要求,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这是考试性质本身决定的。第二,选择题的方法隐含了猜成功的可能。有人说,这种四选一的选择题试卷从理论上说人人都

可拿到 25% 的分数,实际上可能还不止。这就是说,即使让一个真正的白痴来考,一张 100 分的试卷,他也能考出二三十分,这二三十分能代表他的水平吗? TOFEL 等考试的设计者们显然是看到这样的问题的,因此这些年来也作了些改进,例如加大主观题的分量等。而我们现在最流行的教育方法是应试教育。什么叫应试教育? 就是一切围着考试转,考的就是学的,学的就是教的,教的就是编的。因此教辅书特别是考辅书远比教材吃香(这也是中国出版市场“一道亮丽的风景”)。很多时候,所谓上课就是搞模拟考试、做“实战练习”。在这样的教育方法和考试方法下,一个学生考出超出他实际能力的成绩是完全可能的,特别是如果他受过应付这类考试的“攻略”、技巧培训的话。如何能测出实际能力来呢? 很简单,用主观题。对外语学习来说,最好的主观题是考写作和翻译,特别是翻译。中译英、英译中一做,是高是下立刻可以判别。我相信,那位小学生,如果让他去考高三英语的翻译和写作,马上就能显出他的真实能力。如果他还能得高分,那说明不仅他的英语水平,连语文能力也达到了高中水平,真应该作为特殊人才去培养了。

六、语文课的定位

母语学习,也就是语文课,在中小学特别是小学学科体系中的地位究竟是什么? 为什么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把本国语文的教育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中小学给出最多的课时? 这个问题并不是所有人、包括在从事语文教育的教师和教育家、语言学家们都明白的。否则我们就不能解释为什么语文课是最容易被忽视、最容易受到冲击的学科。最早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后来“数理化”换成了“外语”:“学会英国话,走遍天下都不怕”(现在又当仁不让地换成了“爸爸”:“走遍天下都不怕,只要有个好爸爸。”),反正没有语文的份。对语文课的糊涂概念主要有:(1)认为语文课就是语言课,语言就是说话,谁不会说话? 因此语文不学就会,用不着花多少时间。(2)认为语言只是“交际工具”,交际只要达到交际目的,让对方明白你的意思就可以了,语言上对错、好坏是无所谓的,因此错别字、病句等等都是“小节”,久而久之,大家对报刊、影视、各种媒体上的语文错误都见怪不怪。学校教育则大量采用 TOFEL 那样的客观题和应试教育模式,分数也许会很高,但到底能力如何,自己也是一笔糊涂账。语文也就没有人当它一回事了。

究其原因,这是受了某些语言理论的消极方面的误导。第一种观点来自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索绪尔强调语音第一性、口语第一性,从理论上讲没有错,但在语文教育实践上变成片面的重语音轻文字、重口语轻书面语,那就非常有害。受害的不仅是中国,而且包括欧美在内的几乎整个世界,20 世纪以来,全世界出现了语文水平下降的情况,不能不让我们追踪到语言理论的源头。第二种理论来自交际理论,把语言仅仅看

作是交际工具,不重视语言承载文化的功能,不重视语言对文化的反作用力,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语言对于塑造文化(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功能。把语言当作随意操纵的工具,结果糟蹋了语言。

那么,应该怎样给语文课定位呢?我认为,至少要认识到下面几条。

1. 语文课是影响世界观形成的基础课,就如我们在开头说的,母语是人的立身之本。我们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历史认同,我们对这个国家的归属感,是从母语教育开始的。母语教育不是技术教育,不是技艺教育,首先是文化认同教育。一个没有母语认同的人是一个没有家园的人,一个没有母语认同的国家是一个没有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国家。

2. 语文课是最基本的素质教育课。一些年来,我们强调素质教育,但是很多人,包括教育官员们,并没有真正弄清素质教育是什么,而往往把素质教育与正常的课堂教育对立起来,在课堂教育之外,搞出许多花样,结果把原来属于个人兴趣的东西硬派成素质教育的内容。素质教育变成了兴趣班、才艺展示、才艺比赛、才艺考试。前两年我曾在报上读到,某省一位教育厅官员说,“在今天,会不会外语体现了一个人的素质”,让我们这些搞外语的人看了都哭笑不得。什么是素质?素质就是人作为一个人的基本品质,如果人都做不好,即使掌握了再多的知识和才艺,也谈不上有什么素质。因此素质教育,实际上是做人教育。中国传统的语文教育,特别是启蒙教育,是语文教育,更是素质教育,例如《三字经》、《弟子规》等,都是既教了文化,又教了做人。而我们现在把素质教育从语文课抽出来,另搞什么品德教育、素质教育等等,反而不见有效。而在盲目追求知识的过程中,层层加码,结果出现了学知识和学做人脱节的情况。社会上流传说,我们现在是“幼儿园上小学的课,小学上初中的课,初中上高中的课,高中上大学的课,大学生回过头来补幼儿园的课”,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这背后,语文教育的“失位”,应该说是个重要原因。有人会说,我们不是开了专门的品德课吗?我的回答是,语文课的教育是潜移默化,品德课是从外面强加的,很容易流落为装点,效果自然不同。这就像我们在中学和大学开的一些政治课,实际上变成了知识课的一部分,一成了“知识”,学生和老师就用考试和应试教育的方式对付你,尽管可以得到高分,但与真正的思想政治教育关系是不大的。

3. 语文课是工具课。语文是工具,好像人人都这么说,但对“工具”的理解,却并不相同。许多霸占语文教育话语权的人是从现代语言学理论里说的“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这一角度来理解的,其结果只是给语文下了一个定义,而把它与其他科目放到了同等的地位。而我们理解的语文课是工具课,是从整个课程体系着眼的,它是学习其他课程的基础和工具。语文课学不好,所有课程都受影响。在启蒙阶段是如此,在提高阶段也是如此。在启蒙阶段,语文是学习其他课目的基础,没有最起码的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别的课程(如数学、品德、音乐、科学)等就无法进行。因此在各门课程教育中,语文课必须先行,对于中文来说,也就是识字教育必须先行。古代教育一